

香港粤语入文变异研究¹: 以香港报刊杂志语言使用为例

邓小琴

南京大学, 汕头大学

香港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言语社区, 粤语入文是香港言语社区汉语书面语的标记变项, 包含着三种变式: 纯粤语口语文本、港式文白夹杂文本、港式标准书面语文本, 呈有序的功能变异分布, 适用于不同的语域。粤语入文不但是香港言语社区言文一致发展的需要, 也是社区成员有意保有的一种言语行为模式, 具有文化认同与归属的标记意义。丧失汉语共同语口语依托的香港书面语也是粤语入文变异产生的必然。

1. 引言

香港位于中国的东南端, 由香港岛、大屿山、九龙半岛以及新界(含 262 个离岛)组成。面积 1104 平方公里。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二零零八年年中人口数字》显示: 2008 年 8 月居港人口约为 698 万, 其中常住人口约为 676 万, 流动人口约为 21.6 万。华裔人口在总居港人口中占 95%, 外籍人口占 5%,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6410 人²。

香港总体语言使用的分布状态于 1991、1996、2001 年十年间的三次调查中显示, 惯用语言的人口比例分别为: 粤方言 88.7%、88.7%、89.2%, 普通话 1.1%、1.1%、0.9%, 其他中国方言 7.0%、5.8%、5.5%, 英语 2.2%、3.1%、3.2%, 其他语言 1.0%、1.3%、1.2%³, 接近或超过一个百分点变化的主要语言是粤方言和英语。这三组数据表明回归后的前四年, 粤方言继续成为强势方言, 英

¹ 笔者曾就“言语社区”理论对香港粤语入文变异现象研究的方法意义请教过徐大明老师, 在此致谢。文中谬误, 由笔者负责。

² 数字资料来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 GovHK 香港政府一站通。取读时间: 2009. 06. 19. <http://www.censtatd.gov.hk/press_release/press_releases_on_statistics/index_tc.jsp?sID=2174&sSUBID=11920&displayMode=D>

³ 数字资料来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统计处《一九九一年、一九九六年及二零零一年按惯用语言划分的五岁及以上人口》(不含失去语言能力的人士)。取读时间: 2009. 06. 19. <http://www.censtatd.gov.hk/major_projects/2001_population_census/main_tables/population_aged_5_and_over_by_usual_language_1991/index_tc.jsp>

语地位没有因殖民统治结束而呈弱势，普通话的人口使用影响力度没有得到增强。粤方言和其他方言依然占据香港社会的主流生活语言，以 2001 年为例，在总数为 6417739 的人口当中，粤方言使用总人口为 5726972，其他汉语方言为 352562，英语为 203598，普通话为 55410⁴，“三语两文”的语言生态模式，即：粤语、英语、汉语共同语（普通话）“三语”，中文和英文“两文”，是香港语言的存现面貌。香港“三语两文”的语言使用特点，既是香港社会历史发展的沉淀，也是社会变革在语言层级上的投射，在强烈的社区网络互动下，约定俗成地演变成具有高度认同感和标记意义的变异模式。

社会语言学对变异的研究，更多集中于语音的变异，而且研究卓有成效。然而“语言变异可反映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也可反映在语段特征、叙述语体的组织结构等较大语言结构方面。”（徐大明，2007：152），如果说语音、词汇的变异研究在理论建树和方法论的探讨上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那么对于较大语言结构的变异研究则显得相对的滞后与薄弱。语音与词汇的变异多集中于口语方面，涉及语段、语篇特征的变异则体现为话语与篇章建构方面，这些变异的扩散，在深度上会引起语言结构的改变，但由于结构变异的缓慢性及对标准语书面语体更加紧密的依赖性，其变异考察的反馈从即时性角度而言，有其研究的难度。但书面语依然是语言使用的重要层级，对书面语变异的关注与研究也许可以完善语言变异在理论建设上的系统性。语言变异不但体现在共时的口语中，也可以体现在共时的书面语中，对较大语言结构变异上的尝试性探讨是本文的研究宗旨，也是本文选择香港粤语入文作为变异研究角度的出发点。

香港中文书面语呈多种文本变异：港式标准白话文文本、中英夹杂文本、文白夹杂文本、纯粤语口语文本等，在书面语上映射着香港言语社区“三语”并存的指项特征。本文仅对香港粤语入文言学习惯模式进行分析，试图阐释语言变异除了“所指”意义外，使用者的社会标记意义和象征意义也是语言的“隐喻”意义。变异的存在并不一定是语言的交际失误或者是习得失败，而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异化，蕴含着某种人群与其他社群相区别的言语行为特征。

对香港粤语入文的变异研究，本文主要以影响力大和受众面广的报纸杂志作为考察对象及语料来源的标准。报刊类：以《东方日报》、《苹果日报》为代表；杂志类：以《壹周刊》为代表。为了增强不同的言语社区其差异性也必然存在的论证，本文还抽取广州、南京部分销售量极高的报纸杂志作为横向比较的考察对象。广州：报纸《羊城晚报》；杂志《东张新望》。南京：报纸《扬子晚报》；杂志：《东方》。

2. 粤语入文根植于香港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言语社区

“根据言语社区理论，一个言语社区是一个有确定人口和确定活动地点，进行

⁴ 数字来源同注释 2。

频繁言语互动的社会群体。”，“具有人口、地域、互动、认同、设施这些要素”（徐大明，2004：18-28）。

虽然香港经历了15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但在人口的结构上华人依然占据了95%的比例。而且香港人口密度也是世界排名第二。从2002—2007年人口密度统计数字⁵表明，人口密度呈增长态势，2007年，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以九龙为高：43350，其次为香港岛：16170，第三为新界及离岛：3770。高度密集的人口，以及文化背景相一致的社会网络，使香港在资讯的快捷和人际互动密度上闻名于世。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所钟庭耀博士所进行的传媒使用情况的一项民意调查统计数字表明，在拥有大专教育以上水平的香港人士中，每天看报者占64.7%，每天看电视新闻者为72.5%，每天上网超过两小时的为31.3%。而最常看的报纸：《苹果日报》49.5%，《东方日报》22.4%，《明报》15.7%⁶。社会小网络和大众媒体互动是香港社会重要的交际互动模式。人口密度高，媒体密集，文化多元，通讯发达，使香港社会的聚结性极强。而传媒的有效互动所结集生发出来的强劲动力往往是任何一种有认同感的社会变革或者言语新模式得以扩散持续的根本。

港人对母语的认同感一直是强烈的，以香港大学民意网站于1997年8月26—27日与2008年12月9—12日通过真实访员以随机抽样方式所进行的电话问卷《市民身份认同感》为据，在“香港人”、“中国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国人”、“中国人”的认同感方面，1997年8月与2008年12月，被访者身份认同两组百分比数据分别为：香港人34.9/21.8，中国的香港人24.8/29.6，香港的中国人20.1/13.0，中国人18.6/34.4。1997年以香港人作为主要认同身份组合数字为：59.7%，而以香港社区身份相关的身份认同更高达79.8%。2008年以香港人作为主要身份组合数字为：51.4%，而与香港社区身份相关的身份认同依然保持相对大比分：64.4%。回归后的十年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虽然有所下降，但香港市民以“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依然最高⁷。

⁵ 数字来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按区域划分的人口密度》。取读时间2009.06.19.<

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statistics_by_subject/index_tc.jsp?subjectID=1&charsetID=2&displayMode=T>

⁶ 香港大学民意网站，<<http://hkupop.hku.hk/>>，取读时间2009.01.08。直接问卷调查人数为1323，回应率为87.2%，被调查者受教育水平大专以上占比列为56%。

⁷ 2008年12月调查总样本数：1016，回应比例：69.3%。1997年8月调查总样本数：532。每次调查的成功样本数目都在500以上。2000年5月起，成功样本数目更增至1000以上，并且根据香港人口的年龄性别分布加权调整。访问对象为十八岁或以上之操粤语的香港市民。取读时间：2009.01.08。香港大学民意网站<<http://hkupop.hku.hk/>>。香港市民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最新调查结果亦来源于香港大学民意网站2008年12月16日发布的

即使在殖民统治时期，粤语作为港人的母语，与英语的地位关系，也没有在口语交际上呈现出高变体和低变体的语码转换区别，因为粤语口语作为唯一的中文交际语言，在历变的自我调适中，其“文学语言”化也渐生层级上的变异，以应对不同语域的需求。同时，粤语更没有发生如泰国华人社区闽语在第三代逐渐出现的语言转用情况，而世界上大部分的华语社区第三代都面临着放弃本民族语转用英语或其他强势语言的现象⁸。但1949年至回归前，港英政府加大对英语的推广力度及弱化中文的语言政策的存在是不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港英政府为了加强对高端人才的控制，规定：“公务员的任用和升迁英文水平必须达到E级以上。”，并全力扶植以英文为教学语言的学校，“早自1985年开始，凡新设的学校，若不以英文为教学媒介均不能获得政府补助”，这些政府措施从而造成了“中、英文中学的比例从60年代的1:2.5发展到70年代的1:4.3，从80年代的1:7.4再发展到1:10。”（闵海霖，2008：48-51）。然而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学生往往因为对教师话语理解度的困难，学习效果则事倍功半。英语作为二语习得的现实，以及缺乏有效的即时语境的互动，港人在港习得英语的收效也并不理想。但政策上对中文的削弱，是一种极其强劲的语言规划，会深刻影响着语言发展的走向，因为从语言存在的意义来说，最根本的是使用的功利及所赋予的价值评判。

从1949年至1978年，香港与中国大陆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关禁亦使文化交流几乎中断，从而加剧了作为共同语“国语”和“白话文”制衡力量的丧失。而此前，香港虽属殖民统治，但其文化教育仍与内地有着紧密的联系，1932年出版的《国音常用字汇》确立了国语以北平音系为标准音的地位，而白话文运动也奠定了“白话文”成为书面语的典范代表。“战后初期，香港中英文中学的课程多采用1933年傅东华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或郑文瀚、张文治编的《中华文选》及《新编高中国文》”（陈必祥，1987：333-334），1949年，香港政府教育司署开始不批准中学采用国内编印的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课本（陈必祥，1987）。

社会的相对独立，是言语社区疆界构成的基础，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以及近30年与汉民族共同语的完全隔绝，使以占据人口95%的华裔人口把粤语认定为自己的母语，欠缺政府的规划与支持，缺乏官方机构的监察与指引，香港中文书面语变异的多样化成为必然。港人因汉语共同语（国语、普通话）制衡力量的瓦解，以及英语作为法定语言的强势及其作为现实语境中的二语习得地位的劣势，终使粤语入文成为港人母语文化的重要代表。

新闻公报。

⁸ 新加坡语言转用现象例证来源于徐大明先生《儿童双语发展与家庭社会网络》，《民族教育研究》2000年增刊。

3. 粤语入文是香港中文书面语的标记变项

社会语言学的诞生是基于对形式语言学的反动，对语言功能本质意义的再思考。其目的在于解释语言的符号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学上的“所指”意义，而隐喻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语言变异模式的形成既是特定语境下语言使用的结果，同时也是特定言语社区成员交际模式的需求，交际规范的标记。粤语入文是香港言语社区在中文书面语使用中最具特征意义的标记变项。之所以称之为变项⁹，是因为以香港中文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的书面语，可以分出三种主要变式：港式标准白话文文本（或曰粤语文学语言）、港式文白夹杂文本、纯粤语口语文本。港式标准白话文文本指以粤语为读音，但语法规则以现代白话文（国语阶段）为标准，一般不采用粤语方言字和汉字记音方式的书面语，但在语法规则和词汇系统上又与普通话书面语有差异，非通粤语使用者可以阅读，可懂度为高。港式文白夹杂文本指兼具粤语口语和现代白话文书面语风格的书面语，一般直接引语部分是粤语口语化文本，叙述部分基本保留现代白话文特点，是基于香港文（现代白话文）言（粤语）脱节，为增强阅读可读性，贴近现实语言面貌，而采取的一种书面语过渡变式（郭骏，2008），其文本有粤方言字和汉字记音特点，粤语特有词汇也常有出现，非通粤语使用者有一定的阅读难度；纯粤语口语文本指完全与粤语口语一致的书面语，口语化极强，有大量的粤方言字和记音汉字，非通粤语使用者一般不能卒读。

粤语入文变项的产生，也基于这样的一个语言使用的现实，对于香港这个相对独立的言语社区，粤语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方言，而具有超方言的语言地位，香港社会一直以来都以粤语学语文，朗读课文，社会媒体和专业人士也经常推行对粤语正音，从英语词汇中存在的 Cantonese（粤语）和 Mandarin（官话、普通话）两词，可见粤语在香港的地位，港人关于中文的概念是根植于粤语环境中形成的。以下是香港、广州、南京三地报纸杂志书面语使用情况抽样调查的对比分析。

表 1. 香港、广州、南京报纸版面内容及书面语使用情况

抽样报纸	香港《苹果日报》 (对开)	广州《羊城晚报》 (对开)	南京《扬子晚报》 (四开)
出版时间	2008. 9. 29	2009. 1. 5	2008. 12. 11
A 叠版页数	30	16	48
B 叠版页数	18	16	16
C 叠版页数	16	无	16
DE 叠版	有	无	无
共同语标准白话	小部分政论杂文	全部	全部

⁹ 徐大明认为，变项和变式是一组概念，一个变项由一组变式构成，两个以上变式才能构成一个变项。《当代社会语言学》，100-101 页。

邓：香港粤语入文变异研究

文文本			
港式标准白话文文本	AB 严肃新闻（不含标题和直接引语部分）	无	无
港式文白夹杂文本	ABC 大部分	无	无
纯粤语口语文本	C 小部分、文中直接引语、设计对白、E	无	无
语篇语感	粤语（白话文加口语）	普通话	普通话
文字	繁体汉字+粤语字	简体字	简体字

注：1. 报纸每日版面页数一般不固定。2. A 叠：新闻、体育；B 叠：经济；C 叠版：娱乐（内地报纸 A 叠内容基本与香港相同，但 BC 叠分类及内容不同。）3. D 叠：马经；E 叠：副刊（含少儿不宜娱乐文本）。4. 语言使用考察以语篇文本为单位。

表 2. 香港、广州、南京杂志书面语使用情况

抽样杂志	香港《壹周刊》 (综合)	广州《东张新 望》(娱乐)	南京《东方》(文 化娱乐)
出版时间	2008. 08. 21	2009. 12. 18	2008. 12. 26
期号（总）	第 963 期	第 65 期	第 469 期
页数	144	132	80
文章篇数(专栏)	28 篇+2 栏	38	38
共同语标准白话文文本	0	8	38
港式标准白话文文本	1（专栏）	0	0
港式文白夹杂文本	28	3 ~ 4	0
纯粤语口语文本	1(明星专栏)、 其他文本中的大 部分直接引语、 设计对白	26(明星娱乐新 闻)	0

语篇语感	粤语（白话文加口语）	粤语+普通话	普通话
文字	繁体汉字+粤语字	简体字+粤语字	简体字

注：1. 以销量高为抽样标准。2. 不含广告文本。3. 以语篇文本为考察单位，少数变异字词不计入。4. 文本归属判断取相对值。

从以上报纸杂志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

（一）粤语入文是香港汉语书面语最主要的变项标记。粤语入文三种变式具有功能上的分布特点，港式标准白话文文本适用于严肃新闻报道，文本倾向于传统书面语的庄重风格。文白夹杂是港式书面语的主体，是言文脱节的文本具象呈现和语言的自我调节的结果：叙述采用现代白话文，直接引语则粤语口语化文本，以口语为叙事基调的文本接近于全粤语口语入文风格。纯粤语口语文本一般在记录直接引语和娱乐性及消遣性极强的文本中大量出现。这种变体分布已具有约定俗成的特点。

（二）香港与南京报纸书面语使用情况的巨大差异，以及广州报纸的书面语使用情况与南京保持一致，可以证明社会因素对语言使用和变异产生的控制力量，由于南京广州地区的中文书面语以普通话为基础，没有发生具有社区言语特征的语言变异倾向，其中学校普通话教育的制衡，以及社会标准语的使用环境的充分，是维持标准语影响力，尤其是标准书面语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语言政策中标准语的确立是维持语言地位的一个重要社会影响因素。

（三）强势语言，尤其是在经济与文化上拥有强势力量的语言，具有一定的同化力量。广州娱乐杂志大量采用香港的书面语模式，是对其娱乐文化趋同的态度选择，也是地域文化接近，容易引起语言借用的一个证明。由于文化上的强势，语言潜在的扩散影响力，可能会以超越语言的方式在前期进行渗透影响，正如西方文化和日本动漫文化的影响，并不是首先以语言习得为开端的，而是以一种文化的模因(meme)¹⁰或曰文化象征符号的标签化渐进渗透的。此点的思考是由《东张新望》这样一本在广东省销量排行冠军，却在北京、上海、广东同步上市的娱乐杂志所引发的。当然，政治中心的语言强势也具有影响作用，香港回归后，共同语地位明确，以普通话为基础的书面语文本，在香港的报纸中也有限采用。语言强势影响如何扩散，如何运作，此点不在本文中展开，作为相关问题，留待后续研究中论证。

¹⁰ “模因”为何自然先生对“meme”一词的翻译，指文化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相互模仿，散播开来的思想或主意，具有传承性，是人们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模仿行为。（何自然主编，谢朝群、陈新仁编著《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香港粤语入文的三种变式，是汉语在香港言语社区生存状态下的自我调节和顺应。从更大范围的汉语言语社区来考察，虽然香港汉语的标准书面语与口语已基本脱节，但标准语书面语教育的存在，也就意味着传承的使命没有终结。香港初、高中所选的语文课文大部分为经典的传统名篇，分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类，以启思出版社出版《生活中国语文》为例，中一上（初中一年级上册）讲读部分的课文目录有¹¹：1 中山先生的习医时代（郑子瑜）、2 岳飞之少年时代（佚名）、3 桃花源记（陶潜）、4 燕诗（白居易）、5 背影（朱自清）、6 木兰辞（佚名）、7 风筝（鲁迅）、8 羚羊木雕（张之路）。中五（高中二年级）讲读部分的课文目录有：1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2 青玉案·元夕（辛弃疾）、3 [中吕]山坡羊·骊山怀古（张养浩）、4 停车暂借问（节录）（钟晓阳）、5 庄暴见孟子章（孟子）、6 六国论（苏洵）、7 孔乙己（鲁迅）、8 请客（王力）。

书面语中以现代白话文为范式的文本是构成香港言语社区成为汉语言语社区成员的一致性因素，也是维系汉语作为母语文化稳定性的唯一通途。而粤语入文的差异又使其在社区层次上有别于其他社区。“历史和政治进程总是引发语言建设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随时选择一种共同的地道的说法（无意识中形成的共同语或者说被普及的方言），然后就采取的形式加以固定或者严格规范化，使之成为规范语言的典范。”（罗郎·布洛东，2000:67）。粤语入文虽不能说是一种规范语言的典范，但作为香港言语社区的言语交际模式，其文化认同和身份象征意义是非常顽强的，时至今日，香港语文教学语言是采取普通话还是采用粤语，仍处于争议的阶段。

粤语入文从语言使用的本质上来说也是言文一致的需求所致。“香港做为一个世纪以来相对独立的华语社会，粤方言成为这一社会的共同语。言文脱节使人们再一次感觉记录的困难，一种言文一致的书面语体便应运而生。但汉语的文学语言自始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文化积淀，使白话文依然具有巨大的同化力量，因此，以粤方言为基础的书面语体一般只出现在消遣类的文本中。”（邓小琴，1998:37-46），因此，粤语入文不但是语言发展的需要，也是香港言语社区成员有意保有的一种言语行为模式，具有文化认同与归属的标记意义。

4. 粤语入文是有序的异质变体

粤语入文变异遵循着语言的变异规则，呈现出有序异质的特点。“语言虽然是异质的，但并不杂乱五章、毫无秩序的；语言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的交际和认同工具，是因为它有很强的同一性。其同一性并不体现为绝对的同质性，而是体现为各有差异的语言活动形成的一个有序的系统。”（徐大明，2006:11），粤语入文变项在功能的层级上也体现为高低变体（C. A. Ferguson, 1959）的使用状态。其有序的异质变体，可从粤语入文程度多少分为三个层级的变体：纯粤语口语文本、港式文白

¹¹ 不列教材中导读和自习篇目。

夹杂文本、港式标准书面语文本，其文本特色如下：

4.1 纯粤语口语文本

纯粤语口语文本，有人又称之为“粤语白话文”。由于不论是典范白话文文本，还是纯粤语口语文本，港人均以粤语的语音来阅读，而粤方言文白夹杂现象严重，所以，“粤语白话文”之说很难界定港式标准白话文与“文白夹杂”白话文之间的差别，所以本文不采用此种说法。

纯粤语口语文本是香港粤语入文最明显的一个功能变项，也是与汉语标准书面语相差最大的一种变体。其特点就是“言文一致”，既粤语口语（言）与书面语（文）完全相符，实现“我手写我口”之愿望。由于粤语语音基本保留了汉语中古音的面貌，加上古南越语的底层残留，粤语词汇文白历时叠加现象严重，能完整记下粤语口语词汇的汉字有限，为弥补文字记录语言之不足，在纯粤语口语文本中，粤语方言字和汉字记音的现象非常普遍。造字无可厚非，但大量汉字表音不表意也是一种汉字使用的变异行为。纯粤语口语文本中，汉字既表意又表音，加上粤方言字穿插其中，以及完全脱离共同语书面语的语法规范及用词标准的语感，这对于不通粤语阅读者来说几乎难以卒读。汉语共同语口语交际语境的缺失是这种文本得以存在的前提，而日常交流中的粤语化，则为之提供了坚实的语言依托，而其所蕴含的交际随意、轻松风格，及准确记录口语，再现言语的即时性效果，也促使这种文本在交际需求中走向成熟，并约定俗成。其语言使用特点在记录口语对话，直接引语的文本中最能体现。如：

- (1) 大家係成年人，呢啲係人哋嘅¹家事，我哋外人唔知發生乜嘢事，最緊要係當事人大家決定。（《蘋果日報》2008.7.6.C1）——普通话翻译，即：大家都是成年人，这些是人家的家事，我们外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重要的是当事人大家一起来决定。
- (2) 李家誠說：『其實都傳咗好耐，我哋係結婚，但細節唔講啦！（點樣求婚？）太私人問題唔方便講，依家係預備階段，有好消息會同傳媒講，細節唔好問，合適時候會公布，我諗唔會同子淇一齊出嚟好似開記者招待會公佈，我可以講嘅²係，會喺香港擺喜酒。（子淇婚後退出娛樂圈？）未諗。』（《東方日報》2006.12.9.C22）——普通话翻译，即：李家诚说：“其实都传了好久，我们是要结婚，但是细节不好讲了。（怎样求婚？）太私人问题了，不方便讲，现在是准备阶段，有好消息会和传媒讲的，细节就不好问，合适的时候会公布，我想不会跟子淇一起出来好像开记者招待会那样公布，我可以讲的是，会在香港摆喜酒。（子淇结婚后退出娱乐圈？）没想过。”
- (3) Mandy 見到『令女』兩個字，因為筆畫簡單，所以仲識得點讀，之¹後

諗咗一陣，就好醒目咁問：『係咪用嚟形容我，即係話我靚女呀？因為讀音好似。』哈，竟然畀佢估中。（《東方日報》2008. 11. 23. CC12）——普通话翻译，即：Mandy 看到“令女”两个字，因为笔画简单，所以还懂得怎么念，之后想了一会，就很机灵地问：“是不是用来形容我，就是说我是靓女呀？因为读音很像。”哈，竟然被她猜中了。

方言入文自古就有，但如此成熟的入文现象还是少有的，其语法规则及用词完全与粤语口语吻合。在文本中最明显的标记是汉字除了表意字外，还有不少表音字。其中有两种变异类：一类为固有汉字（含被现代汉语废用的古汉字），但在上述粤语口语文本中几乎丧失表意功能，如：呢、乜、依家、耐、諗、仲、畀、估。第二类是粤语方言字，是为记录粤语口语而造的。大部分采用形声法造字，但“意符”比较抽象，一般以“口”字为旁：啲咁嘢咗嚟啲咁咪。

4.2 港式文白夹杂文本

这类文本是香港汉语书面语中最常见的文本，其语法规则以现代白话文为基础，但却融入了大量口语的语感，以及粤语词汇，是一种介于粤语文学语言与粤语口语的过渡文本。这也是因为港人欠缺共同语口语语感浸染，用粤语思维，在习得汉语标准书面语的过程中，长期丧失共同语口语互动的必然。言文不能互动协调的结果，使港人的书面语表达在口语和书面语的相制相协中自成一体，在言事议事中遵循庄重之风，在转述与话语引用中遵循再现原貌，从而造就了文白夹杂，适用于各种语域需求的文本变体。由于文白夹杂，亦文亦语，对港人而言，是一种严肃度与庄重度高于纯粤语口语文本的语体，而又不会与口语语感相去甚远。当然与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的诉求也有一定的关系，因而成为港式传媒书面语变体中最富生命力的文本模式。如：

- (4) 對於陳太不再參選，不少泛民主派人士感到可惜之²餘，同時充份肯定陳太過去七個月在立法會作出的¹貢獻。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表示，陳太過去七個月在議會內十分勤力，每次會議都有出席，其最近一次發言，更令他印象深刻，『陳太最近一次促請政府提交副局長資料嘅³發言，真係精彩絕倫，冇其他人可以講到，因為佢真係好熟悉政府運作，同埋佢真係好有心。』（《蘋果日報》2008年7月6日A2）
- (5)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運動員在台下苦練多時，為的²就是上台爭奪金牌的³一剎那；同樣由香港隻身跑到上海，創立運動百貨公司『Sport 100』（運動一百）的⁴張國倫，耕耘十年，亦押註在今年的⁵北京奧運。
『運動一百』是內地最大的⁶運動百貨公司，一站式售賣 Nike、Adidas

等一百二十個知名的⁷中外品牌；全國有六十間店，年營業額達十億元人民幣。一個香港人隻身到內地開創事業，經已不容易；要兼顧各方競爭，并摸熟內地不同地方的⁸政經民情，做到遊刃有餘，則更難。張國倫說，做生意就如他喜愛的⁹運動馬拉松：『要留意后來者競爭，同時唔可以亂自己嘅⁴步伐，贏嘅⁵就係那份經驗與堅持。』（《壹週刊》2008.08.21.82頁）（注：此篇为全文语篇）

- (6) 六班車取消 過境巴發財 玩殘中港客/電纜毀壞 直通車陷癱/九鐵安排混亂 乘客轟欺騙/芝麻官稱遭襲擊惹恐慌/粵意外通報仍不足(注：以《东方日报》(2006.12.9.A4)新闻标题为例)

虚线“.....”部分是粤语口语文本，但倾向于文雅表达，并没有完全口语化，采用一定数量的常用方言字，而且这些方言字已经具有定型特点，不可以随意选用其他汉字记音。实线“___”部分是粤语语法特点，粤语一般不使用“在……上”介词结构，“有”字具有副词词性功能。浪线“~~~~”部分是粤方言词汇：“勤力”（努力）、“经已”（已经）、“政经民情”（政治、经济、民情）、“玩残”（捉弄得很厉害）。加着重点的字，体现了粤语中保留了一定的古汉语词汇特点，即单字成词。以上这些语法和用词特点，娴熟地交错使用，文白夹杂，别具风格。

4.3 港式标准白话文文本

这类文本在新闻类的书面语中主要出现在社会要闻板块（不含文中直接引语和新闻标题），尤其是在报道国内、台湾、国际新闻，以及比较严肃的政论、时评时常常采用。这种以粤语读音为标准语音，而又注重对规范白话文继承与遵守的书面语体，是香港学校教育所倡导的，也是香港专业人士用以书面交往的正规中文文本。在香港的众多报纸中，《明报》的受众定位是高层人士和教育界，因此，《明报》也是在文本使用上最为规范和传统，可做为港式标准白话文文本存现的代表性报纸。但其销量也因此不能与受众面较广的《东方日报》和《苹果日报》抗衡。

《苹果日报》虽销售量不敌《东方日报》，但在影响力方面，独占鳌头，因而，粤语入文的程度也是较其他两报为高。其他专题性和受众定位比较明确的报刊，亦以其专业性和风格的“读者设计”的不同呈现出粤语入文强度的不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三种文体变式，是一种相对的风格类别划分，而不是语言的绝对变式。港式标准白话文文本一般少用粤语口语的表达模式，语法规范，用词典雅，但由于词汇系统与大陆不同，加之中学语文课较注重文言输入，使其与大陆现代汉语标准书面语存在一定的差异。如：

- (7) 毒奶風暴或導致本港公立醫院奶類供應緊張。一向供應雀巢產品予住院病人的¹⁰瑪麗醫院預計，由於雀巢產品必須獲確認不含三聚氰胺才會恢

復供應，病房短期內可能沒有足夠奶類產品，院方計劃改以維他荳奶代替。（《蘋果日報》2008. 9. 29. A2《產品化驗需時 奶類供應緊張公立醫院或以荳奶代替》）

- (8)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在俄羅斯由於利息高企及缺乏信貸渠道，興建中的¹¹歐洲最高建築物俄羅斯塔也在前日宣布停工，雖然發展商表示并未放棄計劃，但在目前經濟情況下，未能預計何時才能復工。該國另一些地產發展商亦劈價兩成半賣樓。（《東方日報》2008. 11. 23. A19《歐洲最高樓不敵高息錢荒 海嘯殺到 俄羅斯塔叫停》）
- (9) 澳門賭業界傳奇女子兼香港上市公司世紀建業（集團）有限公司股東司徒玉蓮，與現於世紀建業擔任核心管理層兼大股東的¹²兩子一女曾昭武、昭政及昭婉，發生瀆心風暴式的¹³爭產糾紛。司徒玉蓮昨日入稟高院聲言她才是公司及公司名下產業的¹⁴實益擁有人，因她與三名子女前年曾協議將有關資產轉回她名下，以換取她促使解除昭武的¹⁵一項共三億元之³貸款擔保，以及償還聲稱拖欠三名子女的¹⁶一千三百萬元。不過子女們至今逾兩年仍未履行承諾，因此她要求法院頒令強制子女們履行有關協議及作出賠償。（《東方日報》2008. 11. 23. A1《『街市偉』紅顏知己 上市王國爆瀆心風暴 賭后爭產 告三子女》）

以上文本语法基础基本与现代汉语标准书面语保持一致，但用词和行文语感有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喜用长句，修饰成分较多，衔接手段的关联词和代词经常采用单字古汉语虚词，副词和介词也往往采用古汉语虚词，从而使行文凸显古雅之风。

做为衔接手段，上文中加粗字为单字关联词：及、但、亦、因、以等；斜体加粗“该”为单字代词。加着重点字是古汉语介词：予、以、于、与。加双线标记的单字古汉语副词：或。还有定中结构标记词：之，也是使用频率极高的古汉语虚词。可见，单音节词是语篇上保有古雅之风的主要功能标记。当然，由于是现代白话文，其中也不乏双音节词的关联词和副词，如：由于、虽然、以及；未能、仍未。而实词部分，不但有因社会体制不同，还有因香港社会长期沿用并约定俗成的古体中文公文格式影响，而形成的事物名称、专业术语和一般词汇的相异：或（可能）、劈价（降价）、入稟（告状）、声言（声称）、实益（beneficial、有使用权的）、颁令（颁布法令）等。

4.4. “嘅”、“的”、“之”结构助词文本使用的个案考察

“嘅”是在粤语中表定中结构或“的”字结构关系的粤方言字，“的”是现代汉语白话文的常用结构助词，“之”则是古汉语常用结构助词。之所以择取“嘅”、“的”、“之”三个结构助词在香港中文书面语的使用状况中做个案研究，是因为这

三个结构助词的功能分化在体现香港粤语入文的变异特征及其规律上具有典型意义。

以上文所举的9个文本语料为考察对象，“嘅”、“的”、“之”的使用频率及出现文本语境，见表3。

表3.“嘅”、“的”、“之”的使用情况比较

助词 \ 文本语境 使用 频率	纯粤语口语文本	港式文白夹杂文 本	港式标准白话文文 本
嘅 ₅	2	3	0
的 ₁₆	0	9	7
之 ₃	1	1	1

注：1. 以上列9个文本例子为一个集合单位来考察，文本中用上标数字表示出现的次序，如：“的⁵”表示“的”在此为第五次出现。

2. 表3中词的下标数字则表示该词在此集合单位中共出现的次数。如：“之₃”表示一共出现了三次。

从“嘅”、“的”、“之”文本使用个案的考察，可见三个结构助词的使用功能分布与粤语入文的有序变异规则吻合，其表明：

（一）“嘅”主要使用于纯粤语口语文本和港式文白夹杂文本中，是粤语入文在语法层面上的标记项，“嘅”是用于记录粤语结构助词“的”的方言字，因而其功能的分布主要在于记录口语或者直接引语这些具有低变体特征的语域中。

（二）“的”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说明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语法规则的制约作用在香港中文文本中依然占有强势，尽管缺失了汉语共同语口语的互动语境，但汉语书面语的历时渗透和汉文化认同的内核所在，使粤语入文呈限度存现，在香港常用中文文本中，彰显文雅及庄重语体风格的文本基本采用“的”字为结构助词。

（三）“之”在粤语中具有独特的语用地位，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均属常用词。从上列文本考察中，可见“之”可出现在不同语域，这也实证了粤语保留大量古语词的事实。港式文白夹杂文本的盛行，由此可窥得一斑。

本文对粤语入文变项所离析出的三种变式，是一种以语音变异研究方法考察语体变异的尝试，如果说语音变项中存在着旧式、新式、还有过渡式的话，一般意义上，新式与旧式没有逆转发展演变的可能，即新式逐渐代替旧式，但并存状态也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这种代替论对于词、句，甚至语篇的新旧变式而言，则未必是可以成立的。新词未必能够最终代替旧词，句法的丧失有复生的可能，而本文所探讨的三种变式：纯粤语口语文本、港式文白夹杂文本、港式标准白话文文

本，很难称得上绝对的新旧式。相对而言，纯粤语口语文本是新式，港式标准白话文文本为旧式，但前者为低变体，后者为高变体，有各自适用的语域，有功能上的分布，而过渡式的文白夹杂文本，由于最能体现香港言语社区言文一致的语言使用需求，而最富活力。任何变异的肇始，均与语言使用的功能需求有关，语音的不可逆转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词句语篇的变式最终是否演变为功能的细化，这是本文引发的思考。

粤语入文变异在功能上的规律性分布，强度上渗透性的渐入层次，体现了粤语入文有序变异的特点，也正基于此，香港言语社区汉语书面语交际互动才可以实现。

5. 结论

社区是语言变异产生的基础，言语社区拥有一致性的言语交际模式，言语交际行为的约定俗成基于认同的前提与文化归属的需求，语言变异的存在不一定是一种下意识的言语失误或者习得不能，有时变异是社区成员有意识遵守的共同语言行为规约，是言语社区成员的身份标记，具有超“所指”的象征意义。如果说，社区是第一的，语言是第二的，社区是语言的依托，那么语言则是书面语的存在基础。无论一种书面语承载多少经典，如果丧失口语的依托，就会产生变异，甚至变革。汉语文言文使命的终结映射着香港粤语入文变异产生的必然，同时也证明语言存在的本质意义：语言是人类的最后家园（海德格尔），语言是语言使用者的需求，并制约着使用者，一路前行。

参考文献

- 陈必祥 1987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邓小琴 1998 《香港语用现状分析》，《汕头大学学报》第5期。
罗郎·布洛东 2000 《语言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
闵海霖 2008 《香港语文教育发展趋势》，《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诺曼·费尔克拉夫 殷晓蓉译 2003 《话语与社会变迁》，北京华夏出版社。
钱冠连 2005 《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北京商务印书馆。
史蒂文·瓦戈(Steven Vago)、王晓黎译 2007 《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徐大明 2007 《社会语言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4 《言语社区理论》，《中国社会语言学》第一期。
—— 2006 《语言变异与变化》，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05 《语言的变异性与言语社区的一致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Martin, J.R. & Rose, David (2007) *Working with Discourse Meaning Beyond the Clause*,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Murray, Stephen O. (1998) *American Sociolinguistics Theorists and Theory Group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